

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

巴金在文坛上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他人格的分裂。

他想做的改革事业，已无法做成。

不想做的文学事业，

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

陈思和 著



再见，又恨又爱的故乡

大江东去○李家老屋

出世之前○广元县的三个片断

死神○家族真相○又恨又爱的童年

理想，将与明天的太阳同升

理想的升起○信仰与活动○初出窠门

在南京○第一次北上○为主义而战

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赴巴黎○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玛伦河畔

《灭亡》的诞生○回国年间○西湖的梦

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人格的榜样○激清○跨人文坛

南国的梦○北方的呼号○日本之行

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文学的新生代○转折点：趋向平稳

萧珊○聚散两依依（一）○在孤岛

聚散两依依（二）

梦

梦

陈思和 著

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张珏

封面装帧 陆震伟

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

陈思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 × 115 6 1/32 印张 8.75 插页 3 字数 199,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1339-X/I·18

定价 4.80 元

人格的發展

巴金傳

冰心題



序一：一个人的历史真实

贾植芳

思和对我说，他写作的《巴金传》，主要是突出传主的人格发展轨迹。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读心得和在生活实践中的思考与体验，深刻地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所走的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从传主的整体生活史和创作史出发，将传主的人格生长发展史，分为七个环节，即：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从人格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塑造巴金的形象，显示了一个人性大循环的历程。他这种人格重塑的写法，可以说，完全冲破了过去流行的按文学史分期，即按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范畴，来撰写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传统模式，是一种创新之举。我认为，从巴金先生漫长的生活和创作的历史实践来看，思和这种新式的立传手法，也是更能贴近实际的，因为他写出了一个人的历史真实，更有助于读者对于作为人的巴金和作为作家的巴金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人们认识历史，品味人生，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

“风格即人格”，或如作者所说：“文如其人，文见其人”，人是第一义的，文是第二义的。文格的特色，正是作家的人格境界的体现。作家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格发展史的表现和反映形式。我虽然只读了思和这部传记原稿的部分章

节，但我要说，思和作了一个成功而可喜的尝试。而这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写法，是需要有深厚的学力功底，更需要花出大的勇气，才能写出来和写得象个样子的。

思和这部《巴金传》，虽然限于篇幅和其他因素，只走笔到传主人格历程中的第五个环节，即平稳阶段，后面的两章，或最后两个环节一沉沦与复苏阶段未能给以充分施展的机会，未免是美中不足，使人有遗珠之憾！但我想，读者诸君从前五章的描述中，大概也就可以认识和理解到作为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是文坛巨匠的巴金先生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了。

我和思和是十多年的老相识了。虽然我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我们能一见如故，声息相通。我在与世相隔了二十多年之后，在人生的暮年时刻，有缘与象他这样在“文革”的苦难中长成，而又能在做人上有品有德，在做学问上也有胆有识的青年一代人相遇和交往，真象在荒凉无垠的沙漠中长途跋涉的旅人，突然发现了草原和清泉一样地感到莫大的欢欣和慰藉，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历史的未来。1986年我曾为思和与李辉合写的第一本论著《巴金论稿》写序，现在我又为他的另一本关于巴金的书写序，实在喜不自胜。因为思和以自己的诚实和勤奋写出了人生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我想，读者诸君也会象我这个老人一样，喜欢这本写得诚实的书的。

1991年3月23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序二：谦谦君子，博精求新

——序陈思和《巴金传》

余思牧

陈思和先生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继《巴金的生活和创作》(法国·明兴礼著、王继文译,1950年5月第1版)、《作家巴金》(余思牧著,1964年1月第1版)、《巴金和他的作品》(美国·奥尔格·朗著,1967年版)、《巴金》(美国·内森·K·茅著,1978年第1版)、《巴金评传》(陈丹晨著,1981年8月第1版)、《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李存光著,1982年8月第1版)、《巴金的生平和创作》(谭兴国著,1983年3月第1版,1988年7月增补再版)、《巴金论》(汪应果著,1985年10月第1版)、《巴金论稿》(陈思和、李辉合著,1986年4月第1版)和《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艾晓明著,1989年6月第1版)等等评传类的巴金传记,和《巴金研究资料》(李存光编,1985年9月第1版)、《巴金年谱》(唐金海、张晓云编,1985年10月第1版)等等研究巴金生平的专著出版之后的又一本在资料广博、内容精练中求论点、选材新颖的巴金生平及学术研究专著。更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第一本以研讨巴金先生人格的发展为写作中心的《巴金传》。

自从1949年以来,许多读者因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国新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者或编者由于种种局限、失误和偏见，在写作时有意或无意间贬低了巴金先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否定了巴金先生的创作意图和影响，从而无法全面地正确地去认识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创作。这不只是对辛勤创作、热爱真理、勇于探索的作家巴金不公平，就是对繁荣发展中国的新文学事业和世界华文文学事业，都是没有好处的。到了1978年后，十年“文革”浩劫过去了，中国公布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一时间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隐隐若现，文学评论的状况趋向积极、宽松，并且有重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呼声。因此，中国文学界对1927年旅居法国巴黎时就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928年以其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登上中国文坛，被鲁迅誉为“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从事文学创作生涯凡六十余年的研究论析，有了进了一大步的、景况空前热烈的发展，并且取得了越来越令人瞩目的成就；新资料、新观点、新思考不断披露；一本又一本的研究专著、论文专集、大型资料丛书以至二十余卷本的《巴金全集》、十卷本的《巴金译文选集》等将相继面世；老年的与中年的巴金学术研究者，纷纷鼓勇前驱，为研讨巴金工作开路；年轻的巴金学术研究者也已人材辈出，竞一日之长短。陈思和先生就是一个中国年轻一辈的巴金学术研究者中崭露头角、赶到他的前辈前面或追上他的前辈式的佼佼者。

陈思和先生1978年才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接受正规的专业大学教育，在贾植芳等名师悉心教导下，在广泛地学习中外文史哲著作的基础上，既专修比较文学又潜心研究巴金全部著译，长期而经常地搜求中外有关巴金研究的论著，终于在大学毕业后，以他谦虚谨慎的做人态度、严肃认真的治学精

神和勤奋创新的写作活动，取得他的师友和中国学术界的认同。因为我们同是热爱巴金的文艺创作、从事巴金的学术研究的同路人，于是有缘相结交，逐渐由相识者成为互尊、互信和互勉的忘年之交。

记得那年是1988年春夏之交，陈思和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到香港来当了四个多月访问学者，他临离开香港返上海之前的数天（记得是7月19日星期六），转折地通过中大中文系讲师、专门研究港澳文学发展史的女作家卢玮銮联络上我。那天，我们一见如故，几乎没有寒暄、没有陌生、没有见外地谈起来了。除了最初的十几分钟听他介绍他自己如何到香港来，来港后如何工作和搜集有关中国的（特别是港澳的）现代当代文学资料之外，我们很快就围绕着上海的文艺界近况、巴金先生的生平事迹、生活实况和学术思想（特别是《随想录》）交谈起来。从下午四时许谈到晚上十时许，从我的写字楼移到邻近的富都酒店中幽静的“高地餐厅”，我们边吃晚餐边说心事，完全不觉得时间的过去。临近餐厅要休业，我们被迫分手时，他还诚恳地握住我的手说：

“欢迎您到上海来，那边有一批年轻的巴老学术研究者，他们都是很热情的，一定可以跟您交上朋友。”

我虽然感谢他的邀约好意，但是，我当时实在不相信会有这个机会。我每次到上海去，都是为了洽谈生意，很少是为了探亲或旅游的。事实上，自从1968年我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至1984年离加拿大再返香港这段长时间中，我不单只是离开了出版界、教育界，停止了用华文来写作，甚至跟往昔交谊密切的中国及香港、东南亚的文艺界或出版界朋友们疏远了或没有了来往，而转行到专事对华的投资及贸易岗位上去，往来的全是生意人。虽然我对中国的古典的或现代、当代的文艺与学术的

喜爱，一如往昔，却只是限于抽暇阅读、搜存资料、订购新书刊，已无法耽在图书馆或整天地从事文艺创作或研究学术了。直到1984年的7月、8月和10月间，我因洽购棉花到了上海、巴金先生因领取中文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来到香港，我有幸在一年中跟巴老相叙了四次，面谈了近六七个小时；我们谈近况、谈中外出版界的发展、谈一些朋友的去向和谈各自的未来愿望；我感动于巴老一再对我的关怀和惋惜我弃笔从商的好意，才又执起笔来写点散文，做个业余的海外华文写作者，而且大部分时间还是集中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巴金学术的研究。所以，陈思和、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1986年4月出版，6月运到香港零售时，我就第一时间购读了。我对当时只有31岁的陈思和、29岁的李辉这对曾经历了中国巨大历史变化才侥幸进入大学、在大学里勤奋地研究中外的文艺思潮与学说，学会了从多方面去探讨中国的作家的文艺思想、艺术风格，以及与中外古今文学、传统文化、学术思潮的关系，晓得独立思考问题并把自己的学术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清扫多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界因紧跟风气或要遵指示以论代史，脱离客观事实，脱离历史特点又背弃作家的生活实况及思想艺术的实质的不正之风。在《巴金论稿》中，我感觉到他们一反中国过去多年来的众口一词、万笔一调的程式化、概念化、口号化和简单化的论述方法，而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实况出发，兼及世界大势、国际文坛的发展、思潮和影响，来观察巴金的思想发展及艺术表现，从巴金创作的具体内容、形式和影响去分析评价巴金。他们在巴金学术研究上甚至在中国的文艺评论方法上都有所创新与突破。他们并非老作家、老学者，他们只是初出校门的年轻作家、讲师或记者（李辉当时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们起步得好，路向也正确。

我自觉他们走在我的前面。我早年的拙著《作家巴金》不但是有紧跟风气的痕迹，而且拥有的资料并不充足，限于海外情况还不能论述1949年后的巴金生平、创作和思想发展。陈思和、李辉的合著比我拥有更充分的资料，他们踏实地在这些资料上去观察、分析、思考及评论巴金的家世背景、生平经历、创作思想、艺术表现和对读者的影响。他们提出了独特而新颖的观点与资料，使读者们得以从我前时所忽略或忽视的角度去注意和理解巴金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文艺观、文化素养、个性气质、人际关系、日常言行和创作思想等等，带引读者跟随巴老所处的外在世界、中外思潮的联系，去探索当时仍被中国“文艺界权威”否定或孤立的这位大反封建、无惧迫害的文豪的创作成就与文学贡献，努力塑造出巴金的一生是贯穿着一条红线的一生，是努力去争取个性解放、民族独立、光明与幸福、爱国与爱民等理想实现的一生。他们为巴金树立起正直、爱国、勇敢、远见而进取的、高贵的文豪形象。

陈思和北返了，但他留在我的情怀上，没有离开过或疏远过。何况，我们从此就不时鱼雁相通，交换意见。他1988年9月寄赠给我的新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使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厚望。他这个初生之犊，若有自由的园地可以活动，若有所需的草料滋养，他一定可以献出更多的奶和力来迎接远大光明的前程的。

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1989年11月20日至25日，“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及“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分别在上海市郊青浦县城镇及上海市人民美术展览馆举行，我应邀由海外赴沪参加。安排我出席的人中，自然有陈思和先生的份儿；这些叙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中国的著名学者、作家贾植芳、王瑶、王辛笛、王西彦、蒋孔阳、濮之珍、唐金海、蒋刚、方航仙、李

存光、李辉、汪应果、花建、牟书芳、木斧、刘慧贞、刘慧英、辜也平、祁鸣等和日本作家、学者樋口进、山口守、坂井洋史、岛田恭子等五十余位中外巴金学术研究者，又与我的老朋友谭兴国、吴泰昌、陈丹晨重叙。在五天的共同生活、共同研讨中，我的确体会到陈思和先生所强调的年轻的（以至任何年龄的）巴金研究者的“热情”。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尊重和关怀，坦诚但绝不对立地交流意见，和谐欢乐地、严肃认真地把巴金学术研讨讨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二十多位女士和先生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都是内容结实、各具特色的。陈思和先生在会上发表的是以《现代忏悔录——关于巴金〈随想录〉的随想》为题的讲稿，它深为与会者所注意。毫无疑问，陈氏对巴老晚年力作的论述，确有历史事实作根据，其立论、演绎和结论又是富于创见的。它显示了陈氏治学的勤奋精进、写作的成熟和思想的活泼。在会议期间，我跟陈先生单独地相处或交谈的时间不多，他常为会议的事前安排、会后善后而忙，但我则深感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相互信赖增添了，友谊自然也发展了。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研究巴金的学术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见丰硕的成果；而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权（或专利品），也不是某一大学、研究所的特殊任务。它必然是建立于一种对巴金先生的“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巴金：《怀念鲁迅先生》）自我要求认同，对巴金先生的为了人类的平等幸福、世界的持久和平，也为了向历史、向时代、向社会负责和尽使命而写作，要把心掏出来以心交心，多说真话，坚决地跟假话、空话作斗争，在作品里绝不贩卖谎言，认真地活下去的写作理想认同的基础上，群策群力地就历史事实研究出巴金先生如何为了探索真理、独立思考、追求进

步而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敢探索；同时他又如何热爱祖国乡土、勇于解剖自己、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力求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同年轻人们一起工作、战斗，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写作绝不为了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一定要通过具体的作品去呼吁光明、进步的实现，把心交给读者；如果他的愿望无法实现时，他或是要象受伤的鹰般到了不能展翅高飞的时候，就“滚下海去”；或是要象吃了桑叶的春蚕般、要吐丝，那怕被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或是化作泥土，留在人间温暖的脚印里；……巴金学术研究者们都响应及欣赏巴老的这些理想和呼吁，都自觉地和他走在一起，我们向巴老学习，向巴老致敬。我是这样，陈思和先生是这样，巴金先生的精神感召把我们拉拢起来。

回顾去年十一月，在整个“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举行的过程中，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们、博士班学员和校友们任劳任怨地为五十多位与会者付出了周全的、近乎完美的服务，散会后仍为联系、鼓舞与会朋友们交流学术，重温上海青浦之会的温馨，磋商“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的召开而努力。陈思和先生在这个时候向读者献出他新著的、十七万言的《巴金传》，更为巴金学术研讨工作起着倡导的作用。他的这一新著，由海峡两岸同时出版，不仅为台湾或海外的读者们在阅读巴金的创作散文或小说时指点迷津，也为专门研究巴金学术的作家、学者们在思考时作了陪伴者。

陈思和先生的《巴金传》虽然只用十七万字以内的篇幅来描述及论析一个创作字数逾千万、年过86岁高龄退寿的语言大师、世界文豪巴金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人格的发展），真是难度很大、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作家巴金在数十年无限崎岖的人生道途上

所经过的不断追求、探索、失落、寻找、反省、反思心态，和英勇冲刺、奋力挣扎、坚决求真、高擎火炬的言行，所为中国以至全世界的苦难者发放的振奋与温暖，所为中国以至全世界的文艺界作出的重大贡献，所为中国以至全人类的道德标准作出的崇高榜样，在陈思和先生这本《巴金传》中有了一定的反映，是读者们轻易地可以感知的。读者还将会在阅读此书知道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走过的艰巨生活道路，以及他们所向往、所追求、所发现和所推行的许多真理及愿望。那些导致我们现代或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和科学发展、成就的卓越努力，往往是无数有名或无名前辈们基于爱真理、爱人类、爱民族、爱祖国和爱生活而前仆后继地以血肉、以头颅、以一家人的幸福去换取到的成果，也是许许多多的人明智地长期地承先启后地默默工作的结果。倘若读者有志于生活得有意义，立心要生命灿烂开花，那么，通过伟大作家传记的阅读去学习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精神和好德行、高情操，跟伟大作家的既复杂又纯真、既平凡又伟大的心灵相互交流沟通，是有益和必须的。

成功的传记文学决不是可以轻易地写成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也不可能是专为出版界推销书刊而服务的宣传缮稿，相反地，必然是作者的精心之作。因为文艺评论是促进文艺变革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时代、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学事业，不但是以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也以那个时期那个社会的文学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而成功的文学家的传记作者，正是能够掌握纯熟的语言艺术技巧、具备充分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知识，对其所描绘、评论作家的生活时代背景、社

会背景及与其同时代生活或有承继、影响的有关人物渊源无不涉猎，然后剥茧抽丝，按时按地、依事依物，并根据作品特色、创作思想和读者反应，组编评析，塑造出传记主人翁的准确、完整、具体而生动的形象来，予读者以新信息、新形象、新启发及新影响。但是，若跟象巴金先生这样创作活动期长、作品影响广大和文坛地位崇高的世界性作家的数逾千万字作品相比之下，任何对他歌功颂德的文章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的。巴金先生的巨大而具体、生动的、优秀而多式多样的作品，已为他在文学发展史上或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树立起丰碑，无须他人替他锦上添花。随着中外巴金学术研究队伍的发展与扩大，我们作为巴金生平、学术的研究者或作品的热爱者之一，只能以为中国新文学创作或世界华文写作发展而服务的态度，尽可能做到明确地对巴金先生的家庭背景、生活历程、思想发展和创作生涯、创作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而且尽可能运用客观的历史事实、掌握正确的美学观点去认识巴金的真善美精神世界，从而对其具体创作进行独特的探讨与评价，启发读者对巴老的为人与为文、人品和文品联系起来看，有感情地去认识他和有批评地去学习他。假如本书的读者们没有感到作者的描绘论述曾歪曲巴老的真实面貌、精神世界，作者的美学观点没有落后于时代思潮、没有违反巴老倡导的：“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敢探索……”的指向，那么，陈思和先生已取得了成功，能够表现得站得高、看得远了。

许多位厚爱于我的朋友（包括陈思和先生在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希望我能改写那已重印了21版的拙作《作家巴金》或写一本《巴金评传》，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意愿与冲动。可惜我年来商务缠身、东奔西跑，难得安定下来生活，故此无法专心从事研究或写作，只断断续续地写了些散文和完成了《巴金年谱简编》

(约三十万言)暂补《作家巴金》一书的不足。如今，陈思和先生的《巴金传》发表，无论他的观角与观度是不是跟我相同，我都得感谢他；没有他的新著，我就没有了新的启发。

巴金先生说：“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春蚕》)“他们(作家——余按)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一封回信》)“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我的“仓库”》)“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相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把心交给读者》)巴老是十分尊重读者和信任读者的，他认为他的每个读者，都有权用他自己的看法来评价作家的作品的。我想，研究巴金学术有成的陈思和先生也是。

陈思和先生来信嘱我代他的新著写一篇序，我就大胆地也是坦诚地写出如上的话，作为他的一位远方朋友的致意。并祝他的作品，受到读者们欢迎。

1990年9月6日写于加拿大温哥华

目 录

序 一：一个人的历史真实(贾植芳)	1
序 二：谦谦君子，博精求新(余思牧)	1
小 引：作者的独白	1
 第一章 再见，又恨又爱的故乡	4
大江东去——李家老屋——出世之前——广元县的三个片断——死神——家族真相——又恨又爱的童年	
 第二章 理想，将与明天的太阳同升	34
理想的升起——信仰与活动——初出夔门——在南京——第一次北上——为主义而战	
 第三章 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75
赴巴黎——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玛伦河畔——《灭亡》的诞生——回国一年间——西湖的梦	
 第四章 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115
人格的榜样——激情——跨入文坛——南国的梦——北方的呼号——日本之行	
 第五章 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173
文学的新生代——转折点：趋向平稳——萧珊——聚	